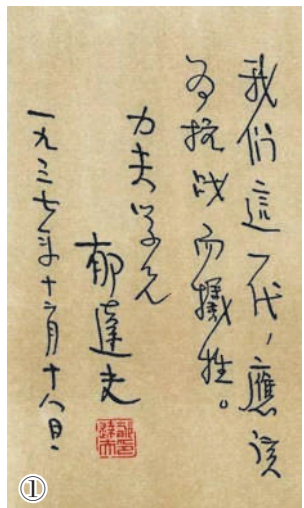


郁达夫的南洋岁月

张一帆

今年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诞辰130周年。读者印象里的郁达夫，多半是《沉沦》中苦闷迷惘的少年，或是发表《毁家诗纪》的激愤名士。实际上，作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，郁达夫是当时中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，在海内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郁达夫在民族危亡之际走出书斋，辗转浙东、皖南抗日前线，以战地记者身份记录中国军民的不屈抗争。1938年末，他远赴新加坡，应邀主持当地华文报纸的副刊工作。直至1945年殉难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，郁达夫再也没有踏上故国的土地。人生最后7年间，身在南洋的郁达夫以笔为戈，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

①

编副刊，育新芽，团结革命力量

郁达夫之所以远走新加坡，意在“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”，动员更多侨胞支援抗日战争。起初，郁达夫担任《星洲日报》早报副刊《晨星》和晚报副刊《繁星》主编，后接编和创办马来西亚《星报》《星期日》、《文艺》双月刊等报纸副刊和杂志。

在新加坡生活3年有余，郁达夫为侨胞的抗日运动和侨胞文化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热情。他不仅主编各种报纸副刊、参加大量社会工作，还写下包括政论、随笔、诗歌、文艺评论等400余篇。抵达第二天，他就写下政论《估敌》，坚信“最后胜利，当然是我们的，必成必胜的信念，我们决不会动摇”。这些文字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，也对国内的抗日宣传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。

郁达夫在接编《晨星》时说：“这一块小园地，若能在星洲，在南洋各埠，变作光明的先驱，白昼的主宰，那岂不是祖国之光，人类之福？”正是借助这一块园地，他团结、培育了温梓川、冯蕉衣、铁抗、王君实等一大批青年作家，为新马华文文学留下宝贵的种子。

1941年末，日军轰炸新加坡。当地群众掀起抗敌热潮，“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”应运而生，郁达夫被推举为团长。著名报人张楚琨白天和郁达夫一同演讲、慰问星华义勇军，晚上看到他熬夜编辑副刊，不禁赞叹，郁达夫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来不曾有过畏惧，他瘦削的躯体里爆发出火一般的生命力，“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”。

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，老舍、郭沫若、王昆仑、孙师毅曾联句一首相赠：“莫道流离苦，天涯一客孤。举杯祝远道，万里四行书。”郭沫若还附了数行短信：“达夫：诗上虽说你孤，其实你并不孤。今天在座的，都在思念你，全中国的青年朋友，都在思念你。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？他竟糊涂涂到底了，可叹！”

郁达夫之所以“不孤”，不仅因其过往的创作，还因为他在新加坡坚持文化抗战的功绩，不论祖国的故友旧友还是未尝谋面的文学青年，大都看在眼里。张资平同为创造社核心成员，曾与郭沫若、田汉、成仿吾、郁达夫等人一起为新文学作出重要贡献，却最终沦为汉奸国贼。不胜痛惜之外，郁达夫也引以为鉴，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：“时穷节乃见，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，不能见松柏之坚贞，自是确语。”而他自己，就配得上这样的确语。

匿真名，护同志，坚持抗日斗争

1942年初，新加坡沦陷。郁达夫与胡愈之等20余位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界友人同船撤离，抵达当时还是荷兰殖民地的苏门答腊。帕亚昆布是郁达夫人生的最后一站，在这座意为“草地沼泽”的荒凉小城里，他化身酒厂老板，借做翻译之机，与日本宪兵周旋。

据张楚琨回忆，郁达夫冒着危险摸清宪兵队每一个人的性格、嗜好和习惯，“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，他说了几句，就放了”。作家高云览因为一件小事被扣，就是郁达夫保释的；陈嘉庚遭到日军搜捕，也是郁达夫用计支开宪兵队，掩护了这位爱国侨领。

我们难以估量，化名“赵廉”的郁达夫承受着怎样的压力：白日里要左右逢源，夜里也要提心吊胆。他晚上睡在宪兵部，因为害怕自己的梦话暴露身份，只得和同屋的日本宪兵交好，以常做噩梦为由，请对方在他说梦话时马上叫醒他。就这样，郁达夫在宪兵队建立起一张紧密的关系网络，因为有他的庇护，帕亚昆布成为流亡文化人的落脚之处。

然而，郁达夫的身份到底还是暴露了。宪兵队里熟悉新加坡文化界情形的翻译洪根培早就认出“赵廉”就是郁达夫，只因想从他这里获取利益而未马上告发。他央求郁达夫为自己做媒，当郁达夫得知女方是自己

从新加坡一道逃难而来的朋友的未婚妻后，即便明知有被揭穿的风险，还是坚定地予以拒绝。洪根培一面向宪兵队告发郁达夫，一面利用宪兵队将郁达夫的朋友抓了起来。经过郁达夫斡旋，这位朋友马上就被释放了。

当自己的生命都掌控在敌人手中时，这样的义举弥足珍贵。但自此之后，郁达夫就一直处于日本宪兵监视之下。他自知无法脱身，便劝说朋友们迅速撤离。这些朋友大多等来抗日战争的胜利，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翠柏绿，风骨存，闪耀民族精神

郁达夫自己，又何尝没有等来战争胜利的消息呢？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天晚上，郁达夫在当地华侨侨长家里收听了电台广播。次日清早，他就跑去酒厂，兴奋地宣布了这一消息。此刻的郁达夫还不知道，战争的胜利，反而将他的生命推向尽头。

1945年8月29日晚，郁达夫正与友人在家闲话，一名青年突然造访。郁达夫和他说了几句话，就向大家告辞，说出去一趟再回来，从此杳然无踪。近一年后，著名报人、同在苏门答腊的邵宗汉自联军总部情报处得到消息：据日本战犯供述，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与数名欧洲人一起被日本宪兵枪杀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一说法成为学界共识。直到1985年在浙江富阳召开的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，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发表了调查报告。

根据铃木正夫的调查，郁达夫在离家当夜就被杀害了。他并未死于日军高层的命令，是宪兵队长怕郁达夫太了解自身底细，命令手下将其杀害。屠杀发生整整40年后，加害者亲自向铃木正夫坦白了这一事实。“战争将人类驱迫向疯狂，所以我们需要作出努力，使得今后不再有战争发生。”在调查报告中，铃木正夫这样写道。

彼时，战争已然结束，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自身罪行又犯下新的罪行，这已经不能用战争狂热来解释了——与之相反，这是侵略者在战争狂热过后深思熟虑的结果。这种谋杀知情者以逃避审判的恶劣行径，让人无法原谅。

同在战争之中，郁达夫从来没有为了自保而违背良知，他的人性光辉从未被战火掩盖。郁达夫既是为挚爱的祖国，也是为人道主义信仰而牺牲。他的死，与他生前的功绩一道，将永远成为一座丰碑。

（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
图①：1937年底，郁达夫写给文学青年程力夫的短信：“我们这一代，应该为抗战而牺牲。” 资料图片

图②：印度尼西亚棉兰郁达夫纪念馆中的郁达夫铜像。 曹师韵摄

棉兰的历史记忆

曹师韵

旅人心语



3月的棉兰，潮湿，温热，充满生命力。这座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城市，是该国华人居住历史最悠久、聚居最集中的城市之一：老城区一带，商铺的汉字招牌随处可见；骑楼式的南洋建筑让人恍若置身中国岭南老街。

离老城区不远，一座纪念馆静静矗立，纪念着中国现代作家、爱国志士郁达夫。纪念馆规模不大，像城市中的一枚书签，将一位作家在战火中南下、流离异乡的故事无声定格。

走进展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厅中央的郁达夫铜像。他一袭长袍，右手抱着书册，身形清瘦，目光沉静，眉头微蹙，仿佛在思索家国命运。铜像左侧的展柜里陈列着《郁达夫全集》和相关研究著作，一旁展墙依次铺展出“家园”“婚姻”“求生生涯”“文学创作”“抗战时期”“流亡印尼苏岛”等板块。一张张黑白照片，一段段简洁文字，将观众缓缓导向这位作家的生命轨迹。

1938年末，郁达夫应《星洲日报》之邀南下新加坡，从事文化抗日宣传，写下大量政论、时评与随笔等文章，激励侨胞支援抗战。新加坡沦陷后，他又转至苏门答腊岛，在西部的帕亚昆布市隐居埋名生活。他的命运，就此与印尼这片土地及当地华侨华人紧密相连。

郁达夫纪念馆馆长林来荣在展板前停下脚步，对我轻声说：“郁达夫当年用‘赵廉’这个名字生活，被迫给日本宪兵做翻译，却一直在暗中帮助华侨和当地居民。”他指着展板补充道：“有人被抓去审问时，他会在翻译时有意曲解，尽量帮他们减轻甚至免于惩罚。”

沿展板继续前行。墙上一段文字写道：郁达夫生命的最后数年于苏门答腊度过，并长眠于此。他在这片土地上与印尼人民结下深厚情谊，亦留下诸多诗文创作。正如展板所呈现的，郁达夫在印尼的经历，如今已化为恒久的文化

“会呼吸”的火车站

颜欢



域外见闻

24摄氏度，湿度接近70%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热带微气候。

如今，这里生长着来自五大洲的数千种植物，物种数量超过百种：从古巴马棕、巴西橡胶树，到菲律宾香蕉树、马达加斯加旅人蕉……一座车站从交通枢纽摇身一变，成为绿色生态地标。

电影《疯狂动物城2》在全球上映后，影片中蕴含的理想图景触动了人们的心灵：狮子与兔子并肩，北极熊与狐狸携手，物种差异被温柔消解。影片中那片绿意盎然的动物城车站也引起许多观众注意，它在现实中的原型正是西班牙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（见上图，影像中国）。在这里，无论是不同物种，还是城市与自然，都因绿色水乳交融。

乍看之下，阿托查火车站与普通交通枢纽似乎并无不同：电子屏滚动着车次信息，行李箱在地面上拖出急促回响，旅客在站间匆匆穿行。向休息区多走几步，视野突然被一片浓密绿色铺满：高大的棕榈树直抵穹顶，宽阔叶层层叠叠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水汽与芬芳泥土气息，仿佛从干燥城市来到一片微缩热带雨林。

此前此景令人难以置信，这里曾是铁轨纵横的旧站台。上世纪90年代，西班牙大力发展高速铁路系统，阿托查车站随之扩建，新站承担主要交通功能，19世纪钢结构大厅面临是否被保留的抉择。最终，设计师决定将其改造为向公众开放的室内植物空间，并通过完整保留原有钢架与玻璃穹顶延续良好采光条件。于是，在长150余米、高近30米的温暖空间里，阳光透过穹顶倾泻而下，室内温度常年保持在22至

更有意思的是，小小植物园中央的水池曾生活着许多被遗弃的宠物龟。它们被集中安置于此，与周边植物形成共生空间。2018年，由于宠物龟数量增长过快，它们被转移至专业保护机构，留下一段回忆：一座火车站不仅能容纳植物，也能承载人与动植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。

参观阿托查火车站的植物园无需购票，也没有固定路线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它只是候车、换乘途中的一段“经过”。这种自然而然的接触令“自然”不是需要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目的地，而是日常生活本身。

当阿托查火车站的潮湿水雾弥漫过车站穹顶的钢筋铁骨，小小植物园为奔忙的人们提供一道阴凉、一抹绿色。对于高度城市化的当代社会而言，将生态空间引入交通枢纽，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：人们不必专程走进自然，自然就在日常通勤途中。无论是生态保护，还是复返自然，都能以更从容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。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电子信箱：rmbgjkf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阅见世界

从深圳看见未来中国

毛明超



德国与中国，距离有多远？

从地图上看，北京与柏林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，相隔约7500公里。但在驻华逾三十载的德国记者弗兰克·泽林看来，中德两国如同近邻，无论在制度建设、社会发展还是科技进步上，均有诸多交流与互鉴。

作为德国知名的“中国通”，泽林在20年前就曾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深入探讨中国，分享他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验与观察，并将二人的谈话记录整理成文，编辑成《与中国为邻》一书出版，在德国引发巨大反响。时至今日，泽林已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中国的著作，为德国读者解读中国崛起的密码，展现中国智造的愿景。在《深圳：中国式未来》（见右图，资料图片）一书中，他以一座城市为引，徐徐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彩画卷。

为什么是深圳？曾执笔德国《商报》多年的泽林，在本书开篇就将这座“超级城市”定义为“中国崛起的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”。自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到2024年，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近两成，实现了令世界惊叹的跨越式发展。而今泽林开放尤为深刻的，是深圳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，以及创新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巧妙融合。

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高层建筑群中，泽林看到绿色理念已成为未来

城市的“地基”：大楼充分利用光照与湿度降低能耗，以公共广场联结建筑、海水与绿地，让高楼与宜居不再对立。在星罗棋布的文化空间中，他探索充满活力与创意的青春律动：无论是设计师、音乐人还是艺术家，都能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找到灵光一现的时刻，在忘我的拼搏之余享受生活的快乐。在新能源汽车的飞速发展，他发现创新已成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：以智能驾驶赋能车路互联，造就了更安全的道路交通，而不断迭代的电池与补能技术，正不断推动出行方式的根本变革。在与机器人的跨文化跨语际互动中，他赞叹人工智能蕴含的巨大潜力：无人机组协助农业生产与公共卫生，机器人辅助诊断疾病，语音识别让工作变得更为便捷，人机协同正在塑造数字时代新生态。

全书最引人瞩目的，无疑是他与通信和科技企业的交流。泽林清晰地看到，百年变局下的地缘政治博弈，对一个企业、一个城市能够造成怎样巨大的影响。但身处深圳这座“创新港”，他同样认识到，中国从未失去对创新的渴望，始终准备攀登下一座科技的珠穆朗玛峰。泽林写道，中国已实现从“世界工厂”向“世界市场”的转变，如今正在向“世界创新场”大步迈进，正是因为中国将创新视为成就，赋

予变化积极意义，才会如今的科技进步不再是一条自西向东的单向道。中国，早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，更由此感叹，德国别无他法，“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像深圳一样的创新城市。”

这样一种客观、全面而深刻的视角，使泽林的著作不仅畅销德国，也让我受益良多。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，我多次与泽林交流，不仅探讨语词，也分享对中国和德国的理解。我们共同发现，以深圳为例，这座城市清晰呈现中国发展的内在肌理：创新内驱力。这种动力不仅来源于百年中国近代史的镜鉴，也源自中国人在复兴之路上的只争朝夕的干劲；在迎头赶上的道路